



1944年8月——

# 万里指挥的一场锄奸战役

□刘大军

1944年8月，正是一年当中最为炎热的盛夏季节，无边无际的青纱帐成为部队集结和行进的屏障。八路军运西军分区出动4个主力团和7个县大队共5000兵力，东起梁山，西至鄄城，在200华里的战线上，发起讨伐汉奸刘本功的战役。

刘本功是伪鄄城县长兼鲁西剿匪司令，拥兵万余，称霸一方，因为疯狂屠杀抗日军民被称为“刘屠夫”，因为霸占东平千顷湖田又被称为“刘半湖”，是冀鲁豫地区最大的铁杆汉奸头子，也是运西抗日军民最凶恶的敌人。

万里时任中共运西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委，分工负责民主民生运动和敌军工作，组织精干敌工干部建立了“对刘(本功)工作团”，围绕同情我军倾向进步的刘本功部参谋长阎冠英，从伪政权伪团体到伪军伪民团，内外结合，上下联动，专门针对刘本功部开展策反和情报工作。此次讨刘战役计划的制订，就是以“对刘工作团”提供的情报作为重要依据。

战斗打响后，我军势如破竹，一举攻克肖垓、付家庄两个据点，并对工事坚固的刘口据点展开围攻。刘本功出动10个中队的援兵，侧面迂回偷偷进入刘口，使据点里的兵力达到1500人。面对敌情变化，有同志建议，目前敌我兵力基本相当，继续攻坚不利，建议转移兵力攻取其他据点。

万里根据我敌工人员提供的情报分析：刘本功的大部兵力分散驻守各个据点，进入刘口的援兵已经占了机动部队的一半以上，除非不要鄄城老窝，否则



活跃在青纱帐里的敌后武工队(资料片)

不会也不敢再派援兵。刘口据点面积狭小，一下子增加这么多人，内缺粮水，外无救兵，只消围而不打，定会不战而降。

酷暑盛夏，缺粮还好说一点，没水的滋味可实在难熬，我军战士把吃剩的西瓜皮扔进据点，都会引起伪军士兵的激烈争抢。到了第三天，我军一炮炸毁据点里的一个碉堡，顿时血肉横飞，死伤一片，敌人军心大乱，再也撑不下去了，无奈只好打开寨门缴枪投降。

这天中午，军分区首长从刘口据点回到李楼村军分区指挥部，刚刚吃过午饭，突然枪声大作，在院门口负责警戒的几个战士猝不及防，瞬间就被打倒在地。一群身穿黑衣的彪形

大汉旋风般冲进院门，机关枪、盒子枪、手榴弹响成一片，指挥部顿时子弹横飞，硝烟弥漫，司令员曾思玉、政委段君毅、副政委万里、参谋长潘焱等军分区首长全被堵在屋里。警卫班长一边指挥战士拼死抵抗，一边向首长建议立即突围。

万里知道，刘本功有一支特务队，冬天穿皮袄，夏天穿黑衣，人称皮袄队，每人配备长短枪各一支，经过专门训练，战斗力很强，现在面对的应该就是这股敌人。特务队火力猛而兵力少，善于突击却不能持久作战，只要坚决顶住，驻扎在附近的特务连很快就会赶来救援，而在密集的火线下贸然突围，危险性可想而知。

万里等四位军分区首长持枪参战，火力猛然增加了一倍，几个已经冲到院子中间的黑衣大汉被打倒在地，后边的慌忙退回到大门外面重新发起攻击。正是有了这短短几分钟时间的缓冲，军分区特务连已经在指导员孙连捷的带领下增援上来，前后夹击一阵猛打，很快将这股精悍的特务队全部消灭。

此役我军大获全胜，歼敌3700多人，攻克据点37个，彻底摧毁了刘本功苦心经营的200华里封锁线，而军分区指挥部有惊无险，则成了最大的花絮。建国后曾任铁路局长的孙连捷在北京开会时见到万里，两人谈起这次李楼村遇袭的往事，不由得相视而笑。

## 下场最好的梁山好汉是谁

□刘传录

怀，破解了晁盖派与宋江派的矛盾，使梁山水军成为捍卫梁山利益的特种部队。五次反围剿，梁山的骑兵、步兵都不同程度打了败仗，唯独梁山水军一次比一次取得的胜利大，梁山的地理环境决定进攻梁山必须走水路，八百里水面，“四面八方，茫茫荡荡，都是芦苇野水”，湾口港汉多得难以数计，恍如一座永远也捉摸不透的水上迷宫。

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经典战斗场面，官军来犯梁山，陆地战场支持不住，主将先从水路跑回梁山。这时候梁山泊的芦苇荡里冒出一条小船儿，船上的头领驾船悠闲地荡过来，没等对方射箭，那人先扎入水中，半天没动静，然后您会看到对方的船开始漏水，主将多半会被生拉硬拽拖下水，完成一次完美的逮捕行动，这就是李俊领导的梁山水军。正是有李俊为首的强大的梁山水上力量，使梁山成为固若金汤的水上城堡。

面对坚不可破的梁山水军，朝廷也在反思围剿梁山的失败原因，高大尉与梁山的三次战斗都是围绕水军开展的，在李俊的指挥下，第一次是诱

敌深入，堵塞航道；第二次面对朝廷的大船实行火攻；第三次面对朝廷高科技的大海鳌，梁山水军组织敢死队凿穿船底，生擒高俅。如此这般，都显示了梁山水军的强大和李俊的指挥才能。

招安后，李俊随宋江南征北战，多有战功。特别是水灌太原城，李俊巧借天时地利，出奇制胜，攻下太原，但淹死几十万老百姓成为李俊一生的耻辱。李俊是个智勇双全的水军将才，他的武艺或许不如林冲，他的水性或许不及张顺，但他的全面能力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武力和技术。

李俊上梁山后，在一次次征战中证实自己的存在价值，虽然与宋江有八拜之交，但是他没有迷信宋江，保持了自己独立的人格。在三败高太尉的战役中，李俊怕宋江放走官军水军将领，和张横一起把俘虏的水军将领刘梦龙、牛邦喜杀了，就是他对宋江招安政策的不满。招安后，离开了梁山泊的梁山水军能力大打折扣，征讨国凯旋时，李俊等6个水军头领找到吴用要求重上梁山。为了水军的荣誉，李俊没有像

公孙胜一样脱离梁山回家修行，而是为了这支队伍精心谋划，苏州一战，他带领二童等人，率领水军巧出奇兵，拿下了苏州城。苏州乃方腊重地，拿下了苏州，加快了方腊的灭亡！

南征方腊，梁山好汉一个个死去，特别是张顺丧身于杭州城涌金门后，李俊对朝廷，对宋江，对所谓的忠义已经没有了幻想，太湖小结义是李俊保持独立人格的重要体现。他不在宋江的忠义圈子里徘徊了，费宝的一番“何不趁此气数未尽之时，寻个了身达命之处”，更坚决了他们及时而退的决心。得胜还朝，行到苏州城外时，李俊假装中风，要求宋江把童威、童猛二人留下照顾自己，骗过了宋江。然后三人汇合太湖群雄，扬帆出洋。

李俊的出海不同于燕青的隐居，他视野更开阔，人格更独立，在海外实现了自己的抱负。通过一番努力，李俊终于做了暹罗国国主，做了宋江一直想做而不敢的梦。李俊是梁山好汉中下场最好的一个，是梁山精神的传播者和维护者。

【民间记忆】

## 我曾在圣功女中读书

□孟雷

看了3月19日人文齐鲁版的《奇女子周铭洗二三事》，心里很激动，因为我年少时曾在圣功女中读过书，当时周铭洗是教务主任，并教过我课。对此，我记忆深刻。

那时的教会学校都是私立学校，但学费远不像现在的私立学校那么贵，一般家庭都能承受。学校的文化课都聘请中国教师任教(大学里或许有外籍教授教专业课)。所有教会学校的教学大纲都必须按当时中国教育部要求的实施。所以学生在升入或转入市立、国立学校时，在学业衔接上十分顺利。

在我的出生地青岛，教会学校的数量真是不少。我记忆中有如下一些：圣功小学(美国天主教会建，只收女生)、明德小学(只收男生)、文德女中(初高中，基督教会建)、崇德男中(初高中，基督教会建)、礼贤男中(初高中，德国基督教路德教会建)，还有一个就是圣功女中(初高中，美国天主教会建)。有几位美籍、华籍修女住在校内。因为我母亲毕业于教会学校，她认为教会学校对学生“管得严”，所以我就于1943-1949年间在圣功女中读了六年书。

在我入学时，校长是王景秋先生，他也教我们高中数学——三角学。这里要特别说一下教务主任周铭洗，她早年毕业于北大数学系，又在美国读了硕士。回国后在山东大学任讲师。上世纪30年代初曾任圣功女中校长。抗日战争八年间，青岛沦陷，她离开了学校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她和许多美国修女又回到圣功，任教务主任。

当时，我们这些学生都称她Sister Adotph(阿道夫)。她的治校方法在那个年代是纯中国式的。她非常严厉，不苟言笑。随时抓学生的纪律，着装(必须穿校服)、行为举止。她认为女孩子必须文雅。谁大声喧哗、举止张扬，那就离挨她批评不远了。我们称老师“先生”。早上下午去上课时，对迎面相遇的同学必说“早”、“好”。我们教室门上都开了一个小窗，上课时偶然思想开小差，一抬头，周修女正在小窗口望着你，吓得立刻聚精会神听讲。你只要是一个循规蹈矩、努力用功的学生，她对你还是很和善的。我读高一时因患肺炎住院，她和费修女曾拿着花到医院看我，我很感动，因为修女是从来不上街走动的。

现在想起那时的学校生活，我印象很深的另一位英语教师就是美籍修女尤斯苔拉(Sister Eustella)。她岁数较大，但一点不妨碍她讲课时的生动活泼。我们的课本是美国学生用的，不同于国人编的教科书。记得上《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》这一课时，随着故事情节，她又跳、又笑、又哭。不知不觉，我们快乐地上完一课。她总有各种方法训练我们多记单词。各种比赛胜利者，奖励一块大大的夹心巧克力。

还有一位我印象深刻的音乐教师是费修女(Sister Fides美籍)。她非常敬业，简直是音乐方面的全才。我们的音乐课内容丰富，并非只唱歌，她教我们认识各种乐器的模样、名称、发出的声音，以及在管弦乐中的作用。让我们听世界名曲的唱片，讲名曲的意境。最让我们骄傲的是她训练了一个圣功女中军乐队，队员都是初三和高一 的学生，乐器有大鼓、小鼓、小号等，走在大街上，好不威风。课余时间，费修女还教钢琴、小提琴。

圣功女中的毕业生很多考入了山大、北大、齐鲁大学和辅仁大学。再后来，各大学的教师队伍中，青岛各中学的教师中，国内各大医院的医师、护士中，以及中央乐团的演奏员中，都活跃着圣功女中毕业生的身影。如果今天还健在，她们肯定都是耄耋老人了。

我退休后在无数次的校友聚会时，常和大家一起回忆起在圣功女中的学习生活，有一些共同的认识：所有老师的严格施教，使我们普遍热爱学习，自信心强。圣功女中严谨的校风又使我们在少女时代的素质得到明显的熏陶。